

了专用的演奏符号，“管色字谱的左方，加上许多直线，是用以表示时间长短的。因为要它易于了解而省些麻烦，所以完全仿照简谱的方法写的，不过把它改横写为直罢了”（刘天华：《〈改进操〉说明》，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第117页）。工尺谱的速度标记只有极慢板、慢板、快板几种，中等速度被划入了慢板的范围，演奏者无法确切地把握一首作品具体的演奏速度。五线谱对不同的速度和表情有细致的划分。在刘天华的五线谱作品中，对速度、表情做了标记，使学习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乐曲的速度，体会乐曲的意境。刘天华乐谱的重视及其对记谱法的改进，改变了传统音乐人亡曲灭的状况，促进了乐曲和演奏法的传播。

收稿日期 2016-03-10

作者韩星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责任编辑 张秀丽】

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

彭远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缓和了毛泽东在联美抗苏战略和他依旧部分坚持的革命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间接和巧妙的辩护，是对革命外交的局部抛弃，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回归。它的提出和实施是6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外交和80年代以来的和平发展外交之间的必要过渡，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 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及研究状况

三个世界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2月25日，毛泽东又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1页]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全面、系统地向世界宣示了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并郑重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由此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外交的新的战略思路和价值取向。

纵观已有研究，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肯定，一类是相对肯定。“高度肯定说”的代表人物有李捷、姜安等。李捷认为，“文革”前和“文革”早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把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拒之门外，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力求和平与发展的呼声的回应，为中国争取了可以争取的一切力量；而且，这一理论使中国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外交，转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是中国外交史的转折点（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652页）。姜安认为，正是由于毛泽东认识到国际社会矛盾的永续性和国际力量间矛盾的辩证统一性，以及国际政治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才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旨在通过利益的相关性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为世界秩序建构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为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向提供了务实且辩证的路径选择（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5页）。

“相对肯定说”的代表性学者有何理、李丹慧等人。何理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有绝对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存在明显局限。三个世界理论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以意识形态、社会性质为划分标准的外交窠臼,转而将共同发展和国家安全作为外交战略出发点,这些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已由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向维护国家安全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思维模式延续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即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反对最主要敌人,因而在随后的国际关系变化中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该理论对世界和平的持久性也明显低估,过度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何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1页)。李丹慧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以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的转换为背景、以中苏分裂和反对苏联霸权为动因而提出的外交战略,因此,它以建立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主旨,意在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抗衡苏联。但是,也正因为毛泽东过分侧重中苏关系,因此三个世界的外交策略有相当的局限性。首先是外交思维的矛盾性,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却又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套路;其次是外交行为的矛盾性,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主旨的这一外交战略虽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旧思路,但又陷入“以苏划线”的新束缚,口头上宣示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却是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三个世界划分标准缺乏科学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多重标准共存(沈志华、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世界知识》2006年第17期,第24页)。

笔者基本赞同上述研究结论,但更倾向于相对肯定说,同时不同意该说所持的三个世界划分标准不合理的观点,谨对这一问题再做一探讨。

二 革命外交的进一步转型和现实主义的回归

三个世界理论以主权国家的独立、安全、平等和发展的实际利益为目标,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划分敌我标准的旧框架。它向世界宣布中国不称霸的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了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决心。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发展趋势的预判,是“文革”前及“文革”高潮时期的革命外交向和平发展外交转向的一个重要拐点。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两大新认知。

一是对世界革命客观形势的认识产生了重大修正。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世界革命外交因国际局势的变迁已难以为继,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这些变化,使中国反资反帝反殖的世界革命战略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继续推进的可能。

二是认为苏联是比美国更大的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中国安全的头号威胁。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苏竞争中逐渐出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开始实施战略收缩,而苏联的强权政治和全球扩张呈上升趋势,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逐渐超过美国。虽然美国仍然坚持其反共国策,也一再阻挠中国统一,但是由于美苏矛盾空前尖锐,美国为摆脱越战泥潭屡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包括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放风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时刻出面警告苏联,客观来看这时中美在反对苏联霸权方面已存在共同利益。以上形势,遂使中国决策者得出了“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研判。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字面上同时强调反对美苏两霸,而且在一系列反对两霸的官方表述中几乎都是把反美放在反苏前面,比如,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美帝和苏修“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第1版)。但是,不论在现实操作中还是具体的理论阐述上,中国都将苏联视为世界和中国的头号敌人。邓小平在第一次正式宣示三个世界理论的联大讲话时指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如李丹慧所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时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9页)。

其次,以现实主义为逻辑基点,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很多学者认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依据是多重标准的叠加。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划分的依据之一是否以霸权主义为外交政策;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划分依据之一是工业化水平的高低;第三世界与其他国家的又一划分依据是否是前殖民地。但是,这种看似混乱的标准中,还是有理可循的,即对旧有意识形态标准的放弃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逻辑的回归。一方面,以综合国力为基本标准。即以工业发展水平、军事实力为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另一方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的框架,从争夺霸权和反对霸权的角度来划分三个世界。用当时世界上通行的意识形态来看,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包括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见,其划分标准主要是基于现实考量的国家实力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暗含着实力决定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无涉这两个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总之,革命外交时期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

标准实际上让位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国力和利益标准,看似混乱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标准客观上体现了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而且,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的设定,赋予了第三世界作为反对霸权统一战线设想的政治弹性,甚至可以将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组织’在新的‘合作平台’之上”(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2页)。事实证明,这有利于中国外交平台最大限度的延伸,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最后,申明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明确了中国相应的国际责任。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对布迈丁的谈话中说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1页]这实际上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角色:不再是一个以“彻底打倒帝修反”、颠覆现有国际体系为己任的革命国家,而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明确了中国新的国际责任:“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这种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利益诉求,使中国摆脱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转而担负起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民族独立和促进民族解放的大国角色。

综上,继联美抗苏之后,三个世界理论延续了我国外交的务实转向,反映出革命外交在我国外交史上逐渐消解的过程,是对世界革命外交的重大修正。此外,该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集体身份之外,又赋予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身份。

三 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与发展

从1969年珍宝岛事件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逐步确立了联美抗苏战略。此后,为具体实行和强化这个战略,毛泽东先后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旨在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条线”思想是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的,他说:“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69页)“一大片”思想是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他说:“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18页]其意图显然在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

但是,在几乎整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出于避免核大战等复杂考虑,实行对苏缓和政策,进而在中苏之间态度暧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坚持认为苏联是爱好和平、同情它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剥削和欺负第三世界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和平发展,实行不卷入冷战的结盟政策。所以“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的实施遇到了很大阻力。针对这种局势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列为需要反对的第一世界即霸权主义国家,认为它们在世界范围的争夺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号召所有受美苏霸权伤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在提到两霸的时候,均是美在前苏在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担忧。但另一方面,直到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苏联是对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判断。从这个视角看,三个世界理论是迫于形势压力对联美抗苏战略及实施这一战略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局部的策略性调整。

通过对“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和联美抗苏战略当时所遇到阻力的评估,部分学者认为,该理论实际上是对“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抛弃。唐洲雁就认为,提出联美抗苏战略后,由于美苏共同主宰世界趋势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美国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弃了“一条线”和“一大片”,提出了同时反对两霸的三个世界理论(唐洲雁:《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3期,第44页)。对此笔者认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应是在80年代初才改变的,理由如下。

首先,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内容中不仅提到了“一条线”战略,而且也首次提出了“一大片”的思想。在这次谈话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就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从时间上看,“三个世界”理论更可能是对“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调整和发展,而非抛弃。

其次,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报告的国际部分不再把美苏并提,而此前连续三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是把美苏并提为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报告专门提到了“美国霸权主义”,而一次都没有使用“苏联霸权主义”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在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政治报告多次出现的术语。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邓小平那时已经下决心实行不结盟政策,与美国拉开距离,也就是放弃旨在孤立和打击苏联霸权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

另外,邓小平此后还有两次讲话。一是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奈温时曾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

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个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318页)二是在1985年6月4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也有过相似的表述,他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邓小平的这两段话,很明确地说明了“一条线”策略到1980年代初才被放弃。

客观地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在继续将苏联作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的认知基础上,对美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某种有限威胁的承认,是中国对自身所处的国际地位及与各国关系的更加客观的理解基础上对联美抗苏战略的有限纠偏。三个世界理论在表述上将美苏等量齐观的表象,使不少人误认为中国放弃了联美抗苏战略,但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及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主流来看,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结束了“一条线”、“一大片”之后,联美抗苏战略也始终没有放弃。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中美两国始终将苏联霸权作为最大的威胁,由此构成中美合作的最大的战略基础。因此,三个世界战略是对“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调整而非放弃,是对美苏可能的霸权勾结的警告,是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策略性让步,及对联美抗苏战略的掩护和间接辩护。它始终没有真正触动联美抗苏战略。至多可以说,随着1982年开始的不结盟外交,三个世界理论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更多地从形式走向了实际。

四 对两大外交支柱间矛盾的缓解

在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前,中国外交由两大支柱支撑,即联美抗苏和世界革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外交增添了第三根支柱。70年代的中国外交所部分坚持的世界革命,同当时实行的联美抗苏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在联美抗苏战略中,中国希望通过加强美国的力量来制衡并削弱苏联霸权;而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外交又要求中国的外交路线要站稳阶级立场,反对美帝,不向美国妥协。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这两条支柱间的深刻矛盾提供了缓和的空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外交和革命外交色彩。1965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名为《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的社论,首次提出了三个“反对”的任务和“世界革命”口号:“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世界革命、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社论:《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人民日报》,1965年1月5日,第2版)这种指导思想致使中国外交在此后几年几乎处于全面停滞的状态。1960—1969年间由于“反对各国反动派”口号的提出,致使10年内与中国新建交的国家只有17个,而其中16个都是在1960—1964年对外政策还不是特别激进的几年里建交的。1965年只与一个非洲国家建了交。1966—1969年4年时间里,不仅没有与一个国家建交,反而还因为输出“文革”,致使53个建交国或半建交国中,有近30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5个国家还先后与中国断交(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5页)。外交上的孤立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恶化的同时,还使中国面临日趋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中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苏联。从60年代初起,毛泽东就开始设想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并逐渐决定在对外政策上做出大幅度调整。在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的思想(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自此,毛泽东部分抛弃了其世界革命理想,逐渐转而与世界革命的头号敌人美国进行合作。但联美抗苏战略并没有完全阻挡毛泽东世界革命热情的巨大惯性,即使是在与美国和解的同时,他仍旧坚持世界革命理论。世界革命与联美抗苏之间的这种矛盾,在“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后得到了显著缓解。首先,“三个世界”在理论上大大淡化了反帝反资反修的色彩,缓和了世界革命和联美抗苏两大支柱间的内在矛盾。其次,“三个世界”的提出在实践中意味着毛泽东在“革命”方面做出了让步,因为若要践行这个理论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和那些属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各国反动派”发展政府间外交关系。再次,这些曾经的“各国反动派”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因此“三个世界”理论是对联美抗苏战略包括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的巧妙补充和辩护。总之,三个世界理论使中国外交开始逐步恢复到以国家利益为旨归的常态,是从传统革命外交向和平与发展外交过渡的关键环节。也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使“文革”后期的中国外交从一种僵化、单一的病态中走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同联美抗苏战略一样,成为邓小平可以接受的以非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外交革命的出发点。

五 意识形态外交的残留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落脚点或者说基本逻辑是外交的非意识形态化。但是,这个理论中依然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外交痕迹。

第一,毛泽东惯于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思考和观察问题。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阶级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从“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表述可以发现,该理论很看重国际社会中压迫和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进而强调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邓小平在联大上的发言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72.1—1978.12)》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版,第370页]由此可见,在“三个世界”理论中,毛泽东依然继承了列宁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传统,其中第一世界国家是压迫民族,第二世界国家兼具压迫和被压迫的双重身份,第三世界国家属于被压迫民族。

第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战争与革命理论强烈地影响了毛泽东对美苏的看法。列宁强调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对抗使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革命无法避免。毛泽东认为,美苏矛盾本质上就是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斗争,它是长期的、尖锐的、无法调和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72.1—1978.12)》第4卷,第372页]再结合“三个世界”理论确立之后,中国仍然继续支援部分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事实,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意识形态因素即使是在“三个世界”理论确立以后,也存在相当的保留,这种保留同时存在于这个理论内部和与此理论无关的其他外交领域。

任何一种思想或者理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外交指导思想要从革命外交向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与发展外交转向,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三个世界”理论中存在意识形态因素的某些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从策略上及短期来看,三个世界战略理论是毛泽东缓和和摆脱联美抗苏战略和他依旧部分坚持的革命外交之间的冲突,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更少冲突、更多一致、更符合实际思想和战略基础的一个重要努力。从战略和长期来看,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的提出和实施,是继联美抗苏外交之后,中国外交走向非意识形态道路、彻底告别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20世纪6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外交和80年代以来的不结盟外交和和平与发展外交之间的必要过渡。因此,它是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是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其历史地位不容低估。

收稿日期 2016-01-15

作者彭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1100。

【责任编辑 翁有为】